

河南隋唐五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赵志文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 郑州市 450000)

关键词: 河南; 隋唐五代; 考古; 六十年

摘要: 河南的隋唐五代考古硕果累累, 如隋唐东都洛阳城址的勘察与发掘, 巩义窑等重要陶瓷窑址的考古新发现, 洛阳龙门石窟、安阳修定寺塔、登封法王寺塔群、黄河古栈道漕运等重要的历史遗迹等,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的繁荣景象。

Key words: Henan;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archaeology; sixty years

Abstract: Archaeology of the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in Henan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the prospecting and excavation on the site of the Sui and Tang eastern capital Luoyang, the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n the Gongyi and other important ceramic kiln-site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Luoyang Longmen Grottoes, Anyang Xiuding Temple Pagoda, Dengfeng Fawang Temple Pagodas, Yellow River plank roads for canal transport along cliff-sides and other important historical monuments, which reflect in certain extent the splendid material culture and prosperous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Plains.

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经济空前繁荣, 文化发达进步, 在我国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六十年来, 河南的隋唐五代考古硕果累累, 如隋唐东都洛阳城址的勘察与发掘, 安阳相州窑、巩义窑等重要陶瓷窑址的考古新发现, 洛阳龙门石窟、安阳修定寺塔、登封法王寺塔群、黄河古栈道漕运等重要的历史遗迹, 以及出土乐舞俑、骆驼俑、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银币等精美随葬品的贵族墓葬等,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的繁荣景象。

一、隋唐东都洛阳城

隋唐洛阳城址在今洛阳市区及其郊区, 它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 是隋唐时期控制东方的重要据点, 唐代曾一度徙都于此, 其地位仅次于长安, 称之为东都。隋唐洛阳不仅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据

研究, 东都洛阳城的设计规划, 既影响了当时国内新建和改建的地方城市, 也影响了一些地方政权甚至邻近国家的都城兴建^[1]。因此, 洛阳城址的考古工作, 一直是学术界瞩目的课题。1954年以来一系列的勘察和发掘,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考古资料, 大大促进了隋唐两京的研究工作^[2]。

东都洛阳, 是一座封闭式城市, 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在宫城和皇城周围, 还分布有圆壁城、曜仪城、东城、含嘉仓城和东、西隔城等, 外郭城的南半部和东北部分布有三市和里坊区。

(一) 城垣和城门

1. 郭城

郭城平面近方形, 南宽北窄, 周长27.5千米, 城内面积达47.3平方千米。郭城城墙系夯筑而成, 墙体两侧用砖包砌, 墙外加筑有鹅卵石散水和1.80米宽的砖道, 并挖有一条宽13米、深2.50米的护城壕, 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城防系统^[3]。

除西墙无门外，东、南、北三面共有 8 个城门。东墙自北而南是上东门（隋曰上春门）、建春门（隋曰建阳门）、永通门；南墙自东而西是长夏门、定鼎门（隋曰建国门）、厚载门（隋曰白虎门）；北墙自东而西是安喜门（隋曰喜宁门）、徽安门。定鼎门为郭城的正南门，也即洛阳城的正门，门址宽 28 米，分三个门道，东面和西面两个门道宽为 7 米，中门道宽 8 米，两堵隔墙各宽 3 米。

2. 皇城

皇城位于郭城的西北隅，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其东、西二壁与宫城东、西二壁间分别形成一段夹城。经过考古发掘的右掖门是东都洛阳城保存最好的一座城门。该门址宽 24 米，也是一门三道，城门残高 2.15 米。门扉设在门道中央，门向内开，门扉为木制。在最中间的柱础石处，有结构完整的门框石、门砧石，门槛下面平铺石板三方。

3. 宫城

宫城居皇城之北，与皇城南北毗连，西隔郭城西壁与禁苑为邻，东接东城，前临洛河，后置曜仪、圆壁二城。宫城平面近长方形，墙体用土夯筑，内外有砖壁包砌。

应天门是宫城的正南门，也是隋唐东都城规模最大的城门，始建于隋大业元年（605 年），前后沿用 300 余年。现存有东、西两个夯土门阙遗迹，门址的两侧有向外凸出的两堵夯土墙，应是史料所载的“左右连阙”^[4]。

崇天门遗址位于宫城南墙的西部，为单门道结构。门道两侧各有柱础坑 5 个，排列整齐，也是在门道两侧立柱上架过梁、顶部筑门楼的建筑形式。在门洞内路面上遗留有车辙痕两条，轨距 1.40 米^[5]。

（二）街道与里坊

郭城内的街道纵横交错，宽窄相配，形成棋盘式布局。勘探结果显示，在洛河

以南的南北向街道有 12 条，东西向的街道 6 条；在洛河以北的南北向街道有 4 条，东西向街道有 3 条，超出了《旧唐书·地理志》“都内纵横各十街”的史料记载数目。其中，通向城门的各街为主干大街，一般宽 40~49 米；连接坊与坊之间的街道较窄，宽度一般 10~20 米。定鼎门大街北起皇城正门端门，南经天津桥直至定鼎门，又称天门街、天津街或天街，它是隋唐东都城南北中轴线上主干道，现存长度 3000 米，宽 90~121 米，路土最厚处达 0.60 米。主要街道两旁往往设有排水沟，在仁和坊与兴教坊之间的南北街道两侧，曾发现一处排水沟遗迹，沟宽 2.50 米，深 0.80~1.10 米。

隋唐东都城的里坊，由郭城内的纵横街道所组成。关于里坊的数目，《旧唐书》和《唐六典》均记载“凡一百三坊，三市居中。”根据已探明的街道遗迹，在洛河以北可复原东西 6 列、南北 5 列，共 30 坊；洛河以南可复原成东西 11 列、南北 7 列，共 77 坊，总计 107 坊。扣除西、南、北三市所占的四坊之数，实为 103 坊，恰与文献记载相吻合^[6]。由于被市区内的建筑物所压和洛河的泛滥变迁，现仅勘测出洛河南的 55 坊和洛河北的 9 坊^[7]。

通过对明教坊的重点勘探，搞清了里坊的结构与布局。该坊南靠郭城南城墙，西临定鼎门大街，北为宜人坊，东为乐和坊。该坊中部有十字相交的东西向和南北向街道各一条，均与坊外的大街相通，四个坊门开在坊墙的中部。

隋唐东都城内存有三市，南市位于洛河以南的建春门大街北侧，在三市中面积最大，占据两坊之地，市内有纵横街道各 3 条，四面各开 3 门。西市位于郭城西南角的厚载门大街南端西侧，北市位于洛河以北安喜门大街和上东门大街交叉口的西北角，两市各占一坊之地。

(三) 殿堂及居住遗迹

1. 宫城内的夯土殿基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配合洛阳市市政建设工程,在宫城内的中轴线上相继发现 6 处大型夯土殿基^[8]。一号台基东西长 160 米,南北宽 36 米。整座台基分为三部分,中部主体建筑为小型殿阁或门楼,两边为辅助建筑。根据史书记载和一号基址所处位置,应是乾元门的门址所在^[9]。二号台基即武则天的明堂遗址。三号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02.50 米,南北宽 42~47 米,夯土厚度达 4 米以上。该台基规模宏大,夯筑坚实,很可能就是武则天的天堂遗址^[10]。四、五、六号夯土台基可能与宫城内正殿旁的配殿有关。

2. 武则天明堂遗址

明堂遗址平面呈八角形,殿基用红褐土夯筑而成。经发掘,殿基的位置、形制和建筑特点,与文献记载的明堂相吻合。明堂为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在乾元殿旧址上建造,原系隋乾阳殿,后屡建屡毁,到武后时成为宴飨群臣、接受百官朝贺和发布政令之所。武则天去世后,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毁明堂上层,改修下层为新殿,次年又改新殿为乾元殿。武则天明堂遗址是建国以来隋唐东都洛阳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为研究隋唐东都宫殿的形制、布局、规模和建筑结构提供了新资料^[11]。

3. 圆形建筑基址

圆形建筑基址位于定鼎路与唐宫东路交叉路口东侧,南距明堂遗址百米,东距宫城中轴线 50 米。基址为一圆形高台式建筑,夯土筑成,直径 65.80 米,残深 1.20 米。台基周围残存有宽 1.40 米、深 0.50 米的包边基槽。台基中部有一柱基坑,坑口直径 14.80 米,深 2.50 米。围绕柱基坑的夯土台上,还排列有两圈柱础石,内圈一周为 15 个,外圈一周为 23 个,柱础石间距均为 4 米,皆由上下两层共 8 块方形青石组成,每层之间都铺垫厚 4~6 厘米的沙子。在中

心柱基底部出土一件鎏金造像,其上的题记为“维大唐神龙元年岁次己巳四月庚戌朔八日丁巳奉为皇帝皇后敬造释迦牟尼佛一铺,用此功德资助皇帝皇后圣化无穷,永究(久)供养”。神龙是唐中宗李显的年号,从而证实这座圆形建筑建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之前,并且是一个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遗址^[12]。

4. 九洲池遗迹

九洲池遗址位于宫城的西北部,东西长 205 米,南北宽 130 米^[13]。在池北面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宽 5 米的渠道,可能是九洲池的进水口;池的南面东南角也有一条渠道遗迹,可能是九洲池的出水口。在九洲池已知的范围内,探出 5 座小岛,其中 3 座岛上分别发现亭、台建筑遗址各 1 处。在池的西南发现 1 处廊房基址,廊房建筑呈东西向,南北两座并列,其间以 4 条砖铺甬道相连。在两座廊房的东端,还发现两条并列的砖砌下水道,从东北方进入九洲池。

5. 履道坊白居易故居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官至太子少傅,是我国唐代一位杰出的诗人。白居易晚年寓居洛阳,居住在履道坊本宅,直至寿终。1992年10月至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对履道坊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和发掘,共揭露面积 7000 多平方米,出土文物 2000 余件,不仅确定了白居易故居的位置,同时也搞清了里坊的布局^[14]。此次发掘的范围包括白氏宅院居住区和南部的“南园”。居住区遗迹有中厅和东西厢房,中厅平面呈方形,东西两端通过回廊往北与两厢房相连。据此推测白居易故居南有门庭,北有上房,是一座含有前后庭院的两进式院落。居住区南面有引水渠与履道坊西侧的伊水渠相通,很可能就是白居易诗中所称的“南园”部分。

白居易故居内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除了许多建筑构件外,还有许多生活用具。其

中可复原的瓷器多达 500 余件，既有动物珍玩，又有茶具和文具等。文房用具中有石砚、陶砚和瓷砚，其中一件为唐宋时期著名的虢州澄泥砚。茶道用具中有石茶碾、瓷茶碾、茶碗和茶托等。这些遗物和诗人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在一件六面体的石经幢上，各面镌刻有陀罗尼经文共 230 余字，其中有“唐大和九年”和“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等内容，不仅为确定履道坊白居易故居的位置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而且证明了白居易晚年与佛教关系的密切。

（四）东都仓储

粮食为国家之根本，历朝历代对于粮仓的建设都极为重视。隋唐东都粮仓的考古发掘，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于古代仓储制度的认识。

1. 含嘉仓

含嘉仓是隋唐东都城内一处大型国家粮仓，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已发现的最大的一处粮仓^[15]。含嘉仓城在今洛阳老城区的北侧，位于隋唐东都东城的北部，曜仪城、圆壁城的东侧。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710 米，东西宽 612 米，总面积 43 万平方米。仓城四周的城墙用土夯筑，仓城内分作管理区和粮窖区两部分。管理区位于仓城西北部，面积 6 万多平方米，北面有德猷门可直通郭城外，南、东面有隔墙与粮窖区分开。粮窖区已探出粮窖 287 个，按其分布情况推测应有 400 多个。历年来共发掘粮窖 19 个。粮窖均为圆形竖穴式，口大底小，平底，仓口直径 8~16 米，最大者 18 米，深 5~7 米，最深者达 11.70 米。在 160 号粮窖内还保留有大半窖已经炭化的谷子，推测该窖当年储存谷子达 50 万斤左右。

粮窖内出土了许多铁制生产工具和陶瓷器，此外还出土带字铭砖 30 多块。铭砖上文字详细记载了每个粮窖的位置，储粮的来源、品种和数量，以及入库时间和经手人等。这些铭砖的年代多数是武则天时期，最

晚为唐玄宗开元元年，说明含嘉仓从隋大业元年创建到唐“安史之乱”以前是其发展和兴盛时期。

含嘉仓的储粮品种主要是南方的大米和北方的粟（谷子）。铭砖中记载的储粮来源地点，大多在大运河流域两侧，说明储粮主要是靠漕运进入洛阳的，由此可知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2. 子罗仓

《大业杂记》记隋大业元年营建东都洛阳城时，在皇城右掖门“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窖，窖别受八千石”。其范围分布在今洛阳玻璃厂南路之东侧，现洛阳市委家属院一带，在此发现 4 座地下仓窖^[16]。粮窖形制和建造方式均与含嘉仓基本相同，也是先挖一个口大底小的椭圆形土窖，窖底用黄土夯打，夯土上覆盖有防潮层，由上而下是：木板层、蒲草、木板层、蒲草、锯末与碎木屑混合层、蒲席层。与含嘉仓不同的是，这里窖壁上的木板都是固定在土壁上，并在窖底中心部位立柱以支撑圆木搭成的伞形顶架，顶架上铺席和草束，表面涂抹草拌泥，以有利于隔雨防潮。

3. 常平仓

据《唐会要》卷八十九载“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置常平仓。”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含嘉仓城西墙外，发现了 32 座地下粮窖，并对其中的 3 座进行了发掘^[17]。这批粮窖与含嘉仓为邻，也在宫城的禁区之内，通过仓门与含嘉仓相通。

唐代的仓储制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官仓，主要供给官府、军队以及大荒之年的用粮，如含嘉仓、子罗仓等；一种是义仓，即民间自办的公共粮仓，主要是预防地方小灾荒时的用粮，常平仓就是这类粮仓。《旧唐书·职官志》：“尚书省户部之仓部郎中、员外郎掌判天下仓储。各州县的义仓，连同

正仓、常平仓，例归仓曹司仓参军事执掌，由仓督管理。”可见这种义仓之类的粮仓，虽然名誉上是民间自办，但也与官仓一样受到中央控制。

二、隋唐五代陶瓷窑址

由于唐帝国为铸钱而禁用铜器，加之唐中期以后民间盛行饮茶之风，瓷质茶具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瓷器手工业又由于在贸易中瓷器占有重要地位等各种因素，得到充分发展。

河南古陶瓷生产源远流长，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隋唐时期，一批重要的瓷窑相继出现，并形成了不同的窑口。如安阳相州窑，是当时北方青瓷的重要产地。巩义白河窑、新密西关窑、登封曲河窑、鹤壁集窑和荥阳翟沟窑等均以烧造白瓷为主，在新密窑还烧制出最早的珍珠地划花瓷，异常名贵。花瓷俗称“唐钧”，它是唐代陶瓷工艺的又一大成就，它是在深色地釉上饰以浅色彩斑，显得格外醒目。烧制“花瓷”的窑址，目前仅在鲁山段店窑、郟县黄道窑、内乡大窑店和禹州下白峪窑发现。巩义黄冶三彩窑是迄今所知全国三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口之一。唐三彩是唐代陶瓷生产中精妙无双的瑰宝，它一方面保持了秦汉以来彩塑的写实传统，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运用了低温铅釉，烧制出绚丽斑斓的色彩。

(一) 安阳相州窑

安阳古称相州，地近东魏和北齐的都城——邺城。相州瓷窑址位于安阳市北郊安阳桥附近，北临洹河，窑址范围南北长 350 米，东西宽 260 米，面积达 9 万平方米。这里的瓷片堆积层厚 1 米左右，是北方地区发现的隋代青瓷窑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1974 年发现并进行了小面积试掘，2006 年又进行了再次发掘^[18]。

相州窑发现的窑炉上大底小，残高 1.10 米。窑体呈圆形，内径约 1 米。窑壁

用耐火土建筑而成，厚 0.15 米。出土的窑具有齿形支烧、三叉支烧、筒状支烧、支棒、器托、垫饼和垫环等。烧制的器物除青瓷碗、高足盘、四系罐、钵、壶、瓶和器盖等生活用具外，还有一些人物俑、动物俑和各种明器装饰品。其中深腹碗、高足盘和四系罐，在北方地区隋墓中出土较多，是当时北方青瓷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器物。所见俑类有男侍俑、武士俑、文吏俑，均为模制。骆驼则为捏制，形象生动，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这里的产品一般胎壁较厚，胎色呈灰白色，胎质较为细腻，可看出胎土经过淘洗。施釉一般薄而均匀，器物里外施釉，外部一般只施半截釉，有垂釉现象，釉面多有细小冰裂纹。釉呈青色透明的玻璃质，光泽较强，透过釉层可以窥见胎面。已采用叠烧技术，但尚未使用匣钵，在碗、盘类器物里面均留有支烧痕迹。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和贴花多种，纹饰题材以莲瓣纹居多，常饰于器盖的顶部、碗心的中央、瓶的肩部和器座的表面，此外还有忍冬纹、草叶纹、三角形和水波纹等，这可能是受了北朝佛教艺术的影响。

北齐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安阳相州窑的勃兴，应与当时冀南、豫北地区所出现的社会安定分不开。相州窑的产品可以上溯到北朝时期。

(二) 巩义白河窑

白河瓷窑遗址位于巩义市北山口镇白河村，遗址主要分布在水地河村和白河村一带沿西泗河两岸的台地上，总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2005 年 4 月至 2008 年 3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2400 平方米，清理窑炉 6 座，灰坑、灶等遗迹 110 余个。此次发掘，首次发现了烧制白瓷和青瓷的北魏窑炉及其产品，还出土了唐代青花瓷及唐三彩器，（彩版一三）获得重要考古新发现^[19]。

唐代窑炉残长 8.50 米，宽 4.60 米。由

窑前工作面、火膛、窑室和烟囱组成。工作面用耐火砖铺成扇形。火膛平面呈马蹄形，底部遗留一层炉灰。窑室平面长方形，残长3.60米，最宽处3.40米。护墙基部厚0.40米。根据火膛和窑室各部分残留的痕迹可以看出，该窑炉至少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修补与利用。火膛里出土有白釉玉璧底碗、器盖等，窑具主要是匣钵和垫饼等，窑床上也有垫饼遗留，这些都说明该窑炉是以烧制白釉瓷器为主的唐代窑炉。

出土遗物以唐代白瓷为大宗，黑釉和酱釉瓷器次之。白釉瓷器以碗、罐、盆等为主，白釉碗以玉璧底为主，胎较厚。圈足碗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酱釉瓷器可分为内外酱釉、内白外酱釉两种，器形以盆、碗、灯为主。黑釉瓷器有瓶、执壶、碗等。另有少量细白瓷残件出土。有的器物腹部和部分窑具上刻有款识，大多是一器一字，有“马”、“张”、“李”等，并发现有简体字。窑具种类有匣钵、垫圈、垫饼、支烧等。

唐三彩器也有一定的出土，器形有钵、灯、豆、盘、洗、炉和枕等。玩具有人面埴、鸽以及小动物等，也有部分素烧器。一般认为，巩义大、小黄冶一带是烧制唐三彩的专业窑口，白河一带只烧制白釉瓷器。此次发掘出土的三彩制品，进一步扩大了唐三彩在巩义窑的烧造范围，拓宽了人们对唐三彩研究的视野。特别是该遗址出土的一件三彩鸭形盒，无论釉色、造型，还是成型工艺等，都堪称完善。

大量资料证明，唐代已经成功烧制出青花瓷器。由于产品主要外销，以致国内很少看到。唐青花瓷器虽然在1940年代就被发现，但是真正引起世人注目是在1970年代。1975年在扬州唐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唐青花盘和枕的残片后^[20]，学术界掀起了唐青花的研究热潮。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发现的一艘9世纪上半叶的“黑石号”唐代沉船上，发现3件完整的唐

青花盘，再次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21]。白河窑出土的唐青花瓷器，从考古地层学上解决了唐青花瓷器的归属问题，充分证实了唐代青花瓷器的发源地就在河南巩义窑。

考古资料显示，白河窑创烧年代不晚于北魏，唐代是其鼎盛时期。

(三) 巩义黄冶三彩窑

黄冶三彩窑遗址位于巩义市站街镇大、小黄冶村附近，两村相距约2.5千米，遗址散布在两村之间的黄冶河两岸的台地上。1976年以来进行过多次调查和考古试掘^[22]，2002年至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300多平方米，清理出窑炉10座，作坊5处，淘洗池、沉淀池、陈腐池各1处，灰沟12条，灰坑186个，出土瓷器、三彩器、白釉绿彩器及各类窑具3000多件^[23]。

窑炉分为大、中、小三种，平面均近似马蹄形，窑室、烟囱部分皆为半地穴式，普遍采用长方形土坯垒砌，火膛部分用高温耐火砖砌成。窑室内部都出土一定数量的三彩制品和窑具等。5号窑炉是保存最好的一座，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隔火墙、烟囱和护墙七部分组成。火膛平面近似梯形，窑壁略弧，窑室前窄后宽，窑床上平铺一层耐火垫板，在垫板和窑壁上分别涂抹一层较厚的耐火泥，隔火墙下有四个烟道分别通向后面的两个烟囱。护墙采用不规则的鹅卵石堆积在火膛耐火砖墙体的外侧。窑床上黏结有大量圆饼支烧以及窑柱等，有的窑具上留有大量绿釉、黄釉斑块。

作坊分为窑洞式和房屋式两种。窑洞式作坊位于第Ⅱ烧造区，坐北朝南，分前室、中室和后室。仅后室保留窑洞。前室平面长方形，南北长4.70米，东西宽3.56米。中室西扩部分做弧壁，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5米，南北宽2.60米。后室呈弧形顶，高3.04米，平面宽1.88米。作坊内分布有

辘轳坑和练泥池等遗迹。房屋式作坊位于第Ⅲ烧造区，已揭露的4间作坊南北排列，坐西向东，面阔3.60米，进深2.40米。房基四角各有一个柱础石，房与房之间不设隔墙，便于作坊内工作人员走动。从作坊的整体建筑结构、布局及与作坊相关的地层出土的大量素烧器、成批垫圈等分析，这里应是一个集制坯、烘干、素烧、施釉等为一体的庭院式作坊遗存，时代大约在盛唐以后。

黄冶窑烧造时间较长，文化内涵丰富，尤以三彩制品为世人所瞩目。所出的三彩器中，生活器皿和玩具占较大比例，而唐墓中经常出土的三彩马、骆驼、镇墓兽之类的大型俑类则很少见到。生活器皿中有三彩三足炉、双系罐、壶、碗、瓶、盂、灯和枕，黄、绿单彩多见于碗、洗之类，绞胎器仅见于长方形枕。俑类有三彩男侍俑、骑马俑、骆驼俑、抱瓶俑、抱婴俑及象、狮、羊、狗、猴等。还有一件三彩小轿，轿内站一妇人，手扶轿身，造型美观，结构灵巧，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窑具有匣钵、三岔形支烧、六岔形支烧、三角支烧和圆形垫饼等，部分支烧的岔尖上还留有黄彩釉痕。模具种类繁多，有骑骆驼范、小马范和贴花范等。

发掘资料显示，唐代中期的黄冶窑三彩制品明显多于白瓷，但在唐代早期和中晚期，白瓷则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细白瓷的出土，显示了制瓷工艺的高度成就。

(四) 新密西关窑

西关窑遗址位于新密市老城西关。遗址中部有一石桥，原名广济桥，后易名惠政桥。桥南叫菜园沟，桥北为碗窑沟，沟内流淌着一条自北向南流动的季节性河流。从惠政桥往南、北各约400米的范围内，均属于瓷窑遗址分布区，遗址面积达25万平方米。西关窑瓷遗址于1961年发现，1993年9月至12月，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配合新密市环城公路建设对此进行了考古发掘^[24]。共发现唐宋瓷窑3座、瓦窑1座、碾料池1处、

釉料池1处。其中Y2保存较好，属于北方地区常见的馒头窑，由火膛、窑室和烟囱三部分组成。火膛壁面呈青黑色。窑室平面为长方形，南北宽3.40米，进深2.50米，室壁用青砖垒砌。两个烟囱位于窑室后部，通过三个烟道与窑室相通。

出土的唐代瓷器以白瓷为主，其次为青瓷，还有少量黑釉、酱釉、黄釉瓷等。主要有碗、盘、双耳壶、小壶、盒、枕等器物以及俑，以碗、盘的数量最多。典型器物有白釉饼底碗、白釉璧底碗、白釉平底盖盒、青灰釉花边口沿碗、珍珠地划花鹦鹉纹枕等。五代时期瓷器以白瓷为主，其次为青、黑、酱色釉瓷，主要器形有碗、盘、洗、盒、灯、瓶、罐和注子等。典型器物有低圈足斜壁大碗、斜口斜腹矮圈足小碗、黄釉短流注子、六出葵花口碟以及瓜棱碗等。

西关窑所烧制品中，以珍珠地划花装饰最为突出，是目前所知最早应用珍珠地划花工艺的窑口，其中珍珠地禽鸟（鸳鸯、鹦鹉、鸭子）和食草类动物（羊、鹿）等纹饰，是该窑最富特色的装饰图案。

发掘资料证明，西关窑创烧年代可能早于晚唐，下限不会早于北宋中期。

(五) 鲁山段店窑

段店瓷窑遗址位于鲁山县城北9千米的梁洼乡段店村。窑址南北长1000米，南北宽60~120米，面积达1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一般厚2米，最厚处超过5米。该窑址发现于1950年，随后曾作过多次调查，199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首次发掘^[25]，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发现炕房、窑炉和澄泥池等遗迹。炕房地面用炉渣铺垫，砖砌火道东西长17米，其东端为环形弯道与窑炉相连。窑炉砖砌，由工作坑和燃烧室等组成，工作坑内有烧煤痕迹。澄泥池平面略呈方形，是在土坑内用残匣钵或石块垒砌四壁。

唐代产品有黑瓷和“花瓷”，一般施釉

较厚，釉色不甚纯净。“花瓷”常见于瓶、罐、盘、碗、注子和腰鼓等器形。特别是腰鼓，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分有大小不同的型号。宋、金时期的产品主要有青瓷、白瓷、黑瓷、白地黑花和白釉珍珠地划花瓷。元代仅见钧瓷、白瓷和白地黑花瓷器，不少白瓷碗内底部都墨写有草书文字。

三、隋唐五代墓葬

(一) 隋代墓葬

隋代建国短暂，仅存在 40 余年。隋代墓葬上承南北朝，下启初唐，在文化面貌上不易划分。河南地区隋墓发现较少，主要集中在安阳、洛阳和陕州等地，其中纪年墓有数十座，墓主人身份明确的均为某州刺史或具有将军职衔。

1. 安阳隋墓

安阳隋墓的发掘，可以追溯到 1920 年代。1929 年秋，在安阳小屯北地发掘出隋仁寿三年（603 年）卜仁墓，出土了一批青瓷器^[26]。据初步统计，解放前在小屯一带共发现隋唐时期的墓葬 175 座，其中大多数为隋墓。解放后，在安阳地区先后发掘隋代墓葬上百座，出土陶、瓷、石、铁、铜等各类随葬品 2000 余件，尤以随葬的大量陶俑和青瓷器引人注目。这些隋墓均为单室土洞墓，一般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其中少数有甬道。墓道作斜坡式或竖井斜坡式，墓室大多为拱形顶，少数作穹窿顶^[27]。有的还出有墓志铭或砖铭^[28]，为隋代墓葬的断代分期提供了参考。

在安阳隋墓中，开皇九年（589 年）骠骑将军、遂州刺史宋循墓和开皇十五年（595 年）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张盛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宋循墓为单室土洞墓，墓道呈斜坡状，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四角略弧。墓门在墓室南壁中部，墓室偏西处砌有南北向的棺床，葬有人骨架一具。随葬瓷器 5 件，有四系

罐、单耳瓶和八盅盘。陶俑 24 件，分武士俑、风衣俑、侍俑、女俑及骆驼和狗等 6 种；陶器 2 件；墓志 1 合，边长 38 厘米，厚 6.5 厘米，志盖篆书“宋君墓铭”4 字，志文正书，题“隋故骠骑将军遂州使君宋君墓志铭”^[29]。

张盛墓为砖砌单室，墓室平面近方形，四边外弧，东西两侧各有 1 个耳室。墓室北部有东西向砖砌棺床，木棺已朽，上有两具人骨架，为一座夫妇合葬墓。墓内出土随葬品 192 件，其中俑类 95 件，生活用具 53 件，日用器物模型 43 件，石墓志 1 合^[30]。俑类中的侍吏俑、武士俑、镇墓兽和生活用具中的博山炉、象首壶、兽环壶、围棋盘等均为白瓷，釉色白中泛青或泛黄，带有若干青瓷的特征，表明白瓷起源于中原地区，由北方青瓷发展而来。尤其是两件白瓷侍吏俑，一件头戴高梁冠，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握仪刀；另一件头戴盔，身着明光铠，腰系带，下着裤。两俑均脚踏莲花座，是隋代瓷器中罕见的珍品。瓷围棋盘为正方形，高 4 厘米，边长 10.2 厘米，盘上纵横各 19 首，每个角的四、4 位置和中央各有一小孔，现在称之为“星”。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 19 道围棋盘，也是世界围棋史上一件珍贵的实物资料。

石墓志盖篆书“张君之铭”4 字，志文记载张盛生平甚详。张盛墓保存完整，随葬品丰富，墓主人身份明确，为研究隋代丧葬方面的等级制度提供了准确的资料。

2. 洛阳郑开明二年墓

1975 年 10 月，在洛阳市凯旋路东段，发现一座郑开明二年（620 年）^[31]。这是一座有竖穴式墓道的长方形土洞墓，墓道长 1.74 米，宽 0.92 米；墓室长 3 米，宽 1.10 米。墓门用布纹瓦封堵。随葬品有白瓷唾壶、黄釉瓷钵、红陶罐、四神铜镜、金饼。墓内有灰方砖墓志一合，志文墨书，墓主裴氏，死于郑开明二年。因此，该墓出土的白

瓷唾壶和黄釉印花瓷钵，均可以作为隋末唐初的标准器物。

在洛阳北郊的邙山南坡上，曾发现过一座郑开明二年（620年）墓，由墓志可知墓主曾是王世充统治集团的一员。隋大业十四年（618年），王世充在洛阳拥戴东都留守越王杨侗登基。次年四月，王世充又杀越王侗自己称帝，建国号“郑”，改元开明。唐武德四年（621年），即郑开明三年五月，唐军攻破洛阳，王世充被俘，郑遂灭亡。在洛阳发现的这座郑开明二年墓，无疑是王世充两年零一个月的短命割据政权——“郑”的历史见证。

3. 陕州隋墓

1956年，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工程，在陕州（原陕县）刘家渠发现隋开皇三年（583年）昌州刺史刘伟墓和开皇六年（586年）绛州刺史刘穆墓^[32]。刘伟、刘穆为兄弟，两墓东西并列，皆为单室土圜墓。刘伟墓在墓室东壁多一耳室，耳室中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计有陶骑马俑、武士俑、镇墓兽、陶罐、铜镜、铜撮、铜钱、铁剪、铁刀、铁顶针、银币和墓志等，其中两枚银币系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一世（531~579年）时期的遗物。

（二）唐代墓葬

20世纪上半叶，社会动荡不安，洛阳邙山地区大量唐墓被盗，仅张钫在河南新安私邸建造的“千唐志斋”就收藏到唐代墓志1209件^[33]。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经正式发掘清理的唐墓在千座以上^[34]，主要集中在洛阳关林、偃师杏园、孟津西山头、陕州刘家渠、禹州白沙、巩义芝田、三门峡庙底沟等地。正式发表资料的约三分之一，墓主人绝大多数为中、下级官吏或中小地主等，它们反映了河南各地唐代不同时段墓葬的特点。有学者根据已发表的隋唐墓葬资料，将河南隋唐墓分为四期^[35]，在此不予细述。

大批唐墓的发掘，是河南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由于唐墓数量众多，这里仅择其中几座重要的墓葬予以介绍。

1. 偃师李弘恭陵

恭陵是唐高宗李治第五子、武则天长子李弘的陵墓，位于偃师市缙氏镇滹沱村南景山上。陵园坐北向南，平面呈正方形，边长440米。四周神墙现仅存1米宽的夯土墙基。神墙四隅建有角阙，现存基址边长10余米，高3~4米。四面神墙中部均置神门，门外左右分列石狮一对。灵台呈覆斗形，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30米，高22米。神道在南神门外，南北长227米，宽50米，两侧分列石望柱、石天马、石人等石象生。在东侧南起第一、第二石人之间置有石碑一通，碑额刻飞白书“孝敬皇帝睿德之纪”八字，碑文楷书，为唐高宗李治自撰并亲书。李弘之妃哀皇后墓位于灵台东北50米，系一方锥形土冢，底边长40~50米，高13米。李弘死时24岁，葬于缙氏，追谥孝敬皇帝，制度尽用天子礼^[36]。

2. 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

1992年5月至9月在洛阳市南郊龙门镇花园村发掘的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是洛阳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唐皇室墓。封土冢南北长22.30米，东西宽22米，高6.50米。该墓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过洞、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道呈斜坡状，两侧壁面绘建筑、仕女和花草等。过洞位于墓道北端，顶部和两壁面也绘有建筑等内容的壁画。甬道用小砖垒砌，顶部为拱形，壁面均绘有壁画。青石墓门上分别线刻有文武官、猛兽、凤鸟、鸳鸯和牡丹等图案。墓室平面方形，穹窿顶，墓顶和四壁均绘有人物、云气和花草等壁画。

随葬器有粉彩陶镇墓兽、武官俑、男侍俑、女侍俑、塔式罐、瓷碗、铁釜、铜锁、铜钱和石墓志等。墓志盖篆书“唐故贵妃豆卢氏墓志铭”，志文楷书，首题“唐睿宗

大圣真皇帝故贵妃豆卢氏墓志铭并序”。豆卢氏史书无传，为唐睿宗皇帝贵妃，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37]。

3. 洛阳安菩夫妇墓

1981年发掘的唐定远将军安菩与其妻何氏的合葬墓，位于洛阳龙门东山北麓。该墓为单室土洞墓，由斜坡墓道、石构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平面略呈横长方形，南北长2.95米，东西宽3.35米，东西两边各有一个石条包边的棺床。门扉上各刻一个门吏，门额中部刻两只大鸟，门楣上刻一对狮形兽，门框和门墩上刻花草图案。棺床正面则刻有十二生肖像，两边饰莲花和卷草纹。

该墓随葬器物十分丰富，其中三彩器和单彩器就达111件^[38]，数量之多，形制之大，在河南地区同类唐墓中实属罕见，为洛阳唐三彩的断代分期提供了可靠依据。三彩器中的各种胡人形象和骆驼俑以及东罗马皇帝福克斯所铸金币，反映出唐代洛阳在中西交通和贸易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墓内出土的一合墓志盖上楷书“大唐定远将军安君志”，据志文可知墓主安菩为西域“昭武九姓”之一的安国大首领，唐太宗贞观四年（640年）唐王朝击破东突厥，安菩率“衙帐百姓归中国”，受封定远将军，卒于麟德元年（664），先葬长安龙首原南平郊，景龙三年与其夫人何氏合葬于洛城南敬善寺东。

4. 偃师杏园唐墓

杏园村位于偃师市西2千米。1983年以来为配合洛阳首阳山电厂建设，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唐代墓葬69座，其中37座出土有墓志，年代最早者为武周长寿三年（694年），最晚者为僖宗中和二年（882年）。这批墓葬除1座为单室砖券墓外，其余均为单室土洞墓，分别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主人生前以八品、九品官为主，最高官阶不过四品，但随葬品较为丰富，反映

了唐代中下层官吏的社会生活和埋葬习俗，为唐墓的分期提供了断代标尺^[39]。

这批墓中出土了一批工艺精湛的金银器皿和三彩陶俑，还有刻工精细的玉盘杯盒和稀世罕见的金银平脱器，十分引人注目。其中1902号唐墓中出土一枚金戒指，其上浅刻中古时期巴列维语文字，制作工艺具有西亚、波斯、阿富汗风格。李景由墓和郑洵墓各出土一件蛤形鍍金银盒，外表篆刻一对鸳鸯呢喃于花叶丛中，堪称唐代妆奁器皿之佳作。

5. 孟津西山头唐墓

孟津西山头唐墓位于洛阳市区以北的邙山岭上，1991年为配合310国道高等级公路建设，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历代墓葬百余座，其中唐代墓葬近20座，尤以天授二年（691年）屈突季札墓和大足元年（701年）岑氏墓保存较好，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40]。

两墓的墓葬形制和结构相近，均为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在斜坡墓道的北段设天井和壁龛，墓室平面作长方形或方形，均在墓底的西半部铺砌一层平砖以作为棺床。屈突季札出生于名将高官之门，卒时年仅13岁，两《唐书》中均有记载。墓中随葬品以三彩器为主，不仅量多类繁，而且胎质洁白坚硬，造型生动华丽，施釉匀润，色彩鲜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岑氏为清苑公刘府君夫人，其祖上在《周书》和《北史》均有记载，亦见于《旧唐书》中。该墓出土随葬品46件，分为彩绘俑及动物模型、瓷器、陶器、铁器和石墓志。其中女乐舞俑的出土，为研究盛唐时期音乐、舞蹈和服饰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6. 巩义芝田唐墓

芝田唐墓位于巩义市芝田镇西部与南、北两侧。为配合巩义市第二电厂建设，从1987年至1998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了十余次考古发掘，清理汉至清代

墓葬 188 座^[41]。其中唐墓 37 座，均为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有的有天井。每墓随葬器物 30~66 件不等，可分为神器类、侍俑类、家用类、器皿类等。从出土的陶瓷器和唐三彩观察，这些器物均为巩义窑生产的产品，不见其他窑口的遗物，反映了唐代巩义窑规模和影响力之大，并为河南地区唐墓中出土唐三彩找到了明确窑口。

有两座墓出土墓志，其中一座墓出土墓志仅为一块小青石，铭文“大唐开元廿年十一月七日葬明威将军郭神鼎河南府河南县人”。另一座出土墓志的墓主身居濮州司功参军，正七品，为二次迁葬。推测该墓地在唐代可能是以一些失意官员为主的墓地。

7. 三门峡庙底沟唐墓

庙底沟位于三门峡市湖滨区韩庄村，因庙底沟文化而闻名于世。为配合国道 310 线三门峡市城区段拓宽建设，2002 年 5 月至 2003 年 10 月，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24000 多平方米，其中清理唐墓 101 座^[42]。墓葬分为斜坡墓道洞室墓、竖穴墓道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年代从初唐至晚唐，出土各类遗物 462 件。唐三彩数量较少，多为小型器如罐、水注等和动物、人物造型等小玩具，这些三彩器属于巩义窑产品。随葬品中不见同时期其他地区唐墓中常见的镇墓兽，陶俑也很少；带耳类的陶器多被人为地将器耳打掉；所出铁犁往往放置在墓室靠近墓门一侧。墓志一般放在墓室的入口处。以上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三) 五代陵墓

唐亡以后，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从 907 年至 960 年，地处中原的河南在短短的 50 多年里，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五个相互更迭的朝代。由于战乱频仍，所留下的遗迹遗物不多。《五代会要》对这些短命王朝的皇陵多有记载^[43]。其中朱宣陵、刘知远睿陵、郭威嵩陵、柴荣

庆陵和柴训宗顺陵，至今尚保留有陵墓和石雕像等地面遗迹^[44]。此外，在洛阳、伊川等地曾发掘了数座五代时期的纪年墓葬，也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1. 五代皇陵

后梁宣陵为五代梁太祖朱温的陵墓，位于伊川县白沙乡朱岭村南侧，陵园南高北低，园门至陵墓之间的神道两侧有石翁仲排列。据《洛阳古今谈》记载，宣陵封土原高 15 米，现封土残高 5 米，面积约 50 平方米。

后汉睿陵为五代汉高祖刘知远的陵墓，位于禹州市西北 30 千米柏嘴山之阳。陵园从北面南，现存土冢周长 60 米，高 8 米。四面距冢各百米处有一对石狮，原是陵园门外的守门狮子。

后周历太祖、世宗、恭帝三个皇帝，计统治 10 年时间。后周皇陵位于新郑市城北约 18 千米郭店附近，现存陵墓 4 座，分别为嵩陵、庆陵、顺陵和懿陵^[45]。嵩陵是周太祖郭威（904~954 年）的陵墓，位于郭店南 1 千米周庄村南，墓冢周长 103 米，高 9 米。陵前没有石人石兽，与《五代史·周书·太祖纪》或相吻合。庆陵是周世宗柴荣（921~959 年）的陵墓。位于郭店北 1 千米陵上村西，墓冢周长 105 米，高 20 米，墓前砖砌祭坛，陵前石碑林立，现存明清时期御制祭文碑 44 通，时代从明宣德元年（1426 年）至清宣统元年（1909 年）。据清乾隆《新郑县志》载庆陵陵园始建于明朝初年，平面方形，边长 200 米，四周砖墙高 2 米，陵园南大门高 4 米，宽 3 米。顺陵是周恭帝柴宗训（953~973 年）的陵墓，位于郭店村东北约 200 米，墓冢周长 40 米，高 4 米。1991 年对其进行勘察^[46]，该陵由竖穴墓道、砖砌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穹窿顶，直径 6.20 米，高约 7 米。甬道和墓室壁上绘有彩色仿木建筑构件和人物图像。懿陵是周世宗皇后符氏的陵墓，位于陵上村内，现存土冢周长 30 米，高 3 米。

2. 五代墓葬

后梁教坊使高继蟾墓^[47]位于洛阳北郊邙山南麓,1986年7月发掘。为竖穴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平面长方形,拱顶。随葬器物93种,包括陶、瓷、铁、铜、银、铅、石等多种质地。其中五曲葵口青瓷碗和宽折沿平底青瓷盆,器形规整,施釉均匀,当为越窑产品。胎薄质细,洁白润泽,带“新官”款的白瓷碗无疑是定窑产品。青石志盖顶,四刹阴刻四神图案;志文四边阴刻文吏12人,十二生肖动物形象分饰于人像冠顶。墓主高继蟾生前任教坊使,开平三年(909年)卒于洛京,葬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朱杨村。志文详细记述了墓主人家世,可补史书之阙。

1985年在洛阳市东郊史家湾村发现一座后唐墓葬^[48]。该墓为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深2.50米,砖棺位于墓坑中央。墓内出1件瓷罐和1件雕印经咒。经咒右侧绝大部分为经文及画像,左侧为汉文题记,正中莲花之上端坐一菩萨,手持法器,最外部饰双栏,栏框四边正中均饰一坐佛,四大天王立于四角。汉文题记后墨书“天成二年(927年)正月八日徐殷弟子依佛记”,表明此经咒为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二年雕印而成。

具有明确纪年的后晋墓发现两座,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都比较简陋。1956年在洛阳市西北郊邙山坡上清理的一座为横室土洞墓,长2.45米,宽1.30米。墓内随葬白瓷碗、陶罐和陶砚台各1件。陶砚台底部和右边刻有“天福八年八月营造证之”^[49],天福二年(937年)是石敬瑭所建后晋的年号。1957年在伊川县窑底乡西南发现的一座为砖室墓,墓室平面近圆形,深6.70米,墓室周壁用砖砌仿木建筑斗拱和屋檐及家具等。随葬器有陶罐2件、陶盘1件、“开元通宝”铜钱1枚和墓志1方。据墓志知墓主为李俊,安葬于开运三年(946年)十二月^[50]。

1992年9月,在洛阳铁路分局指挥部

住宅楼下发掘一座后周墓^[51]。该墓为单室土洞墓,墓室呈梯形,墓顶拱形,高3.40米。墓室四壁底部有13个小龛。出土器物分置于中部及东南、西南角,有陶罐、瓷注子、瓷托盘、瓷盘、瓷碗、瓷尊、石盒、铁券和铜镜各1件,“周元通宝”铜钱550枚。该墓年代当在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九月至显德七年(960年)之间。

四、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史迹

石窟寺和寺院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产物,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石窟寺和寺院发展的一个高潮,河南地区有10余处石窟寺是唐代开凿或增凿的,寺院更是林立。其中的洛阳龙门石窟、巩义石窟等都是始凿于北朝,至唐代大规模增凿的。荥阳市大海寺、洛阳龙门神会和尚身塔塔基、登封法王寺唐代塔群等,都是隋唐时期重要的佛教史迹。

(一) 洛阳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城南12千米的伊河两岸崖壁上,是我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在南北绵延达1千米的東西两山崖壁上,现存窟龛2100多个,佛像10余尊,碑文题记3600多品,佛塔40余座,其中唐代造像几占三分之二,最有代表性的窟龛有潜溪寺、奉先寺、万佛洞和看经寺等^[52]。唐窟在外立面的处理上,注重简洁明快,往往把造像或题额置于窟门的正上方。窟室为马蹄形、长方形或方形,窟顶作穹窿顶、券顶、方顶或四坡式顶,造像布局大多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的形制。

(二) 荥阳大海寺造像群

大海寺遗址位于荥阳市东2千米,1976年3月在这里发掘出40余件石刻造像,其中11件刻有造像题记,9件有明确纪年。除1通北魏造像碑和1尊北宋释迦牟尼佛之外,其余均系唐代的坐佛和菩萨像。其中一件光相菩萨的题记明确了这里就是当年的大海寺^[53]。8件唐代坐佛分为弥勒佛和阿弥

陀佛两种，在一件阿弥陀佛的束腰莲花座下刻有“显圣二年（762年）八月十六日，……敬造阿弥陀佛像一躯”题记。菩萨像18件，多为高于真人的圆雕立像，据题记可知，刻于唐长庆年间（821~824年），有的菩萨还“金粉间施五色”。

（三）神会和尚塔基

1983年12月，在洛阳龙门西山北麓原唐宝应寺旧址内，发现了唐代名僧禅宗七祖神会身塔塔基^[54]。该塔基系石砌单室，平面近正方形，长1.25米，宽1.13米，高1.20米。东壁第一块石板内侧刻《身塔铭》题记，记述了神会和尚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西壁石板上墨书“东南头”3字。随葬遗物有铜、银、铁、陶器四类，陶钵、铜盂、净瓶等法器，当为神会生前传道所用。

（四）登封法王寺二号塔地宫

登封法王寺塔群，位于嵩山南麓玉柱峰下，现存唐塔4座、元塔1座、清塔1座。二号塔位于著名的法王寺塔东北，为单层砖塔。2000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法王寺二号塔地宫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55]。该塔地宫位于塔基下部中心部位，方向正南，由宫道、宫门、甬道、宫室组成。宫门有三道封墙，第二道用石板封堵，上面线刻莲蓬和仕女图，造型优美。宫室为平面方形，直壁，四角攒顶式结构，砖砌地面，北半部有一坐坛，坛上有一趺坐真身坐像，虽残损严重，但彩绘袈裟依然可辨。地宫内出土珍贵文物二十余件。其中白釉细颈瓶等瓷器胎质细腻，精美异常，世所罕见。鎏金镂空铜炉造型独特，是不可多见的文物珍品。迦陵频伽盒，小巧玲珑，雕刻精细，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根据出土的墨块上模印有“天宝二年绛县上光墨”，可知该地宫的年代当不早于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初步推断二号塔地宫的封闭年代约为晚唐时期。（彩版一四）

五、隋唐五代其他考古发现

（一）黄河古栈道漕运遗迹

在河南境内，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建设工程，1950年代和199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三门峡一带和新安、济源黄河两岸古栈道漕运等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不仅发现了当年的古栈道、开元新河遗迹和河岸的摩崖题记，还找到了唐代的陆道、集津仓、盐仓遗迹和唐宋时期的禹庙、开化寺等遗址，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长达数百里的黄河漕运工程规模之巨大，影响之长远。它对研究汉唐之际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56]。

古代修筑黄河两岸栈道，主要是为了解决关中地区的粮食与物资运输问题。汉至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保护统治中心地区的稳定，多次整修黄河漕运工程，以此来满足京师巨大的消费与西北边关的军粮供给。

三门峡古栈道主要开凿在人门东岸，南端起自梳妆台附近，向北经人门金岛，全长625米。栈道开凿在贴近水面的断崖上侧壁上方有牛鼻形壁孔。在栈道侧壁上保存有40处摩崖题记，记述了有关栈道开凿和航行的情况，题记的年代从东汉直到唐代都有。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曾在三门峡北岸凿山开道9千米，在其东端置集津仓，西端置盐仓，从陆路运送漕粮。考古工作者恰在三门峡附近的龙岩村找到了集津仓旧址，在下仓村找到了盐仓遗址，两仓之间还找到一段唐代的陆路旧道。

八里胡同峡在新安县西沃村西北4千米，长约6千米。在峡谷的两面悬崖峭壁上，共发现古栈道14段。北岸栈道贯通八里胡同峡，由栈道顶部、侧部、栈路、牛鼻形孔、方形壁孔和方形底孔等组成。南岸栈道全段则没有牛鼻形孔，而在侧壁相应位置出现了“D”形手窝。该处栈道与三门峡栈道年代相当，应创于东汉时期，隋唐为其盛

期，到北宋尚有修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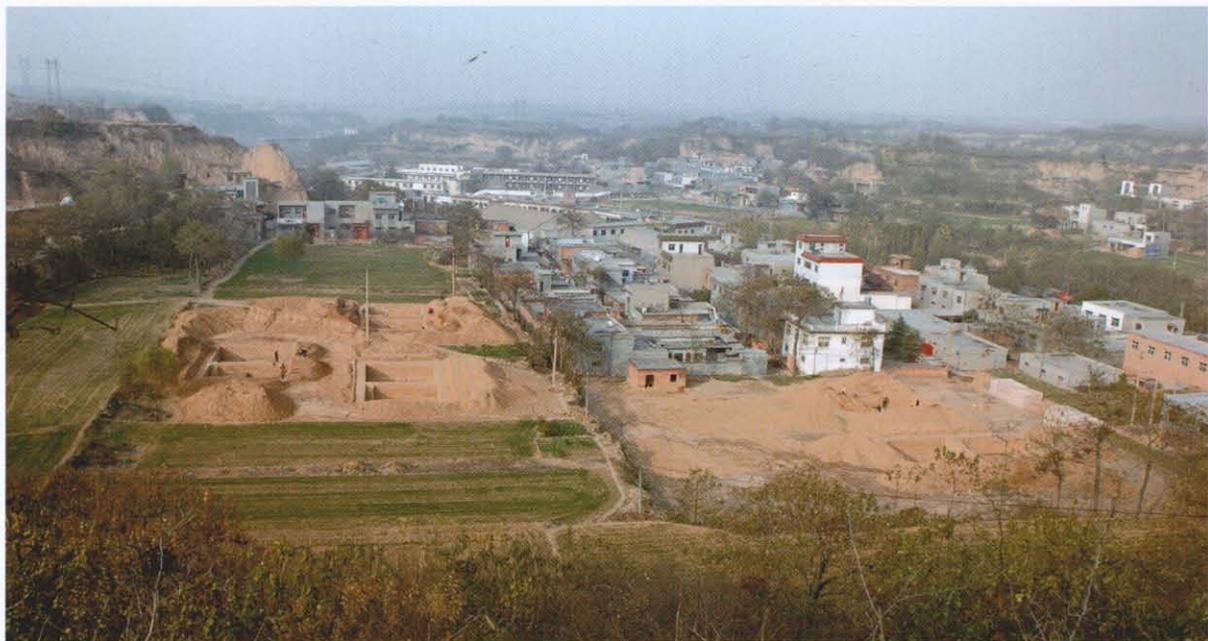
(二) 武则天除罪金简

1982年5月，登封市唐庄乡王河村农民在中岳嵩山峻极峰北侧的石缝中，发现一枚武则天的除罪金简^[57]。金简为长方形，长36.2厘米，宽8厘米，厚近0.1厘米，重223.5克。正面镌刻双钩楷书铭文63字，“上言：大周囿（国）主武曌（照），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_二（日）甲寅，小使愚（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 [1] 马得志. 唐代长安与洛阳. 考古, 1982, (6).
- [2] a. 阎文儒. 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 考古学报, 1955, (9).
b.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 考古, 1961, (3).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 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 考古, 1978, (6).
- [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1981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夹城发掘简报. 中原文物, 1983, (2).
- [4] a.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隋唐应天门遗址发掘简报. 中原文物, 1988, (3).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宫城应天门东阙重现天日. 中国文物报, 1991-01-20.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 考古, 1989, (3).
- [6] 宿白.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 考古, 1978, (6).
- [7] 同 [1] c.
- [8] 同 [5].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唐东都乾元门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94, (1).
- [10] 王岩. 关于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的几个问题. 考古, 1991, (10).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88, (3).
- [12] 方孝廉. 四十年来洛阳隋唐以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洛阳考古四十年.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 [13] 同 [7].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 考古, 1994, (8).
- [15] a. 河南省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 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 文物, 1972, (3).
b.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含嘉仓1988年发掘简报. 文物, 1992, (3).
- [16] 洛阳博物馆. 洛阳隋唐东都皇城内的仓窖遗址. 考古, 1981, (4).
- [17] 同 [12].
- [18] 河南省博物馆等. 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 文物, 1977, (2).
- [19] a. 赵志文, 刘兰华. 河南巩义白河窑发现北魏青瓷、白瓷和唐青花瓷器. 中国文物报, 2008-02-06 (1).
b. 赵志文, 刘兰华. 河南巩义白河窑址. 国家文物局主编. 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c.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巩义白河窑考古新发现.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9.
d.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河南巩义市白河窑遗址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2011, (1).
- [20] a. 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 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 文物, 1997, (9).
b. 扬州博物馆. 扬州三无路工地考古调查. 文物, 1985, (10).
- [21] 谢明良. 记黑石号沉船的中国陶瓷器. 美术史研究集刊 (台湾), 2002, (13).
- [22] a. 郭建邦, 刘建洲. 巩县黄冶唐三彩窑址的试掘. 河南文博通讯, 1977, (2).
b. 傅永魁. 河南巩县大小黄冶村唐三彩窑址调查报告. 考古与文物, 1984, (1).
c. 巩义市文物保管所. 巩义市大小黄冶唐代三彩器窑址调查. 中原文物, 1992, (4).
- [23]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物研究所. 河南巩义市黄冶窑址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2007, (4).
b.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黄冶窑考古新发现.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 [24] a.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南密县、登封唐宋窑址调查简报. 文物, 1964, (2).
b. 冯先铭. 河南密县、登封唐宋窑址调查. 考古, 1964, (3).
c.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 密县文物保管所. 河南密县西关瓷窑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95, (6).
- [25] a. 李辉炳, 李知宴. 河南鲁山段店窑. 文物, 1980, (5).

- b.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鲁山县人民文化馆, 河南鲁山段店窑的新发现. 华夏考古, 1988, (1).
- c. 孙新民. 鲁山县段店唐至元代窑址.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1).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2.
- [26] 宋伯胤. 卜仁墓中的隋代瓷器. 文物参考资料, 1958, (8).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隋墓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81, (3).
- [28] a.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两座隋墓发掘报告. 考古, 1992, (1).
- b. 贾玉俊. 安阳市发现隋代大型家族墓地. 华夏考古, 1994, (4).
- [29] 安阳县文教局. 河南安阳隋墓清理简讯. 考古, 1973, (4).
- [3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 考古, 1959, (10).
- [31] 曾亿丹. 洛阳发现郑开明二年墓. 考古, 1978, (3).
- [32]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 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简报. 考古通讯, 1957, (4).
- [3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洛阳地区文物管理处. 千唐志斋藏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 [34] 因资料众多, 在此不一一引注.
- [35] 徐殿魁. 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 考古学报, 1989, (3).
- [36] a. 若是. 唐恭陵调查纪要. 文物, 1985, (3).
-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 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唐恭陵实测纪要. 考古, 1986, (5).
- [3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发掘简报. 文物, 1995, (8).
- [3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龙门唐安善夫妇墓. 中原文物, 1982, (3).
- [38]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唐墓. 考古, 1984, (10).
-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 考古, 1986, (5).
-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 考古, 1986, (12).
- d.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 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 考古, 1997, (8).
-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杏园唐墓.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40] a. 310 国道孟津考古队. 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 1993, (1).
- b. 310 国道孟津考古队. 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 文物, 1992, (3).
- [4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巩义芝田晋唐墓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 [4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庙底沟唐宋墓葬.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6.
- [43] 宋·王溥. 五代会要 (卷一).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44]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河南省志·文物志. 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 [45] 新郑县文化馆. 新郑县后周皇陵. 河南文博通讯, 1979, (4).
- [46] 李书楷. 五代周恭帝顺陵出土壁画. 中国文物报, 1992-04-05.
- [4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梁高继蟾墓发掘简报. 文物, 1995, (8).
- [4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出土后唐雕印经咒. 文物, 1992, (3).
- [49] 高祥发. 洛阳清理后晋墓一座. 文物参考资料, 1957, (11).
- [50] 侯鸿钧. 伊川县窑底乡发现后晋墓一座. 文物参考资料, 1958, (2).
- [5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发掘一座后周墓. 文物, 1995, (8).
- [52] a. 龙门文物保管所. 龙门石窟.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b. 宫大中. 龙门石窟艺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 [53] 郑州市博物馆. 河南荥阳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 文物, 1980, (3).
- [5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塔基清理. 文物, 1992, (3).
- [55] a. 赵志文. 河南登封法王寺地宫. 国家文物局主编. 2000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 b.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登封市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2003, (2).
- [56]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漕运遗迹.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 b. 河南省文物局等. 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 1998: 65~78.

(责任编辑: 辛革)



1. 巩义白河窑遗址Ⅲ区发掘现场



2. 白河窑出土青花瓷碗



3. 白河窑出土三彩鸭形盒



4. 白河窑出土白瓷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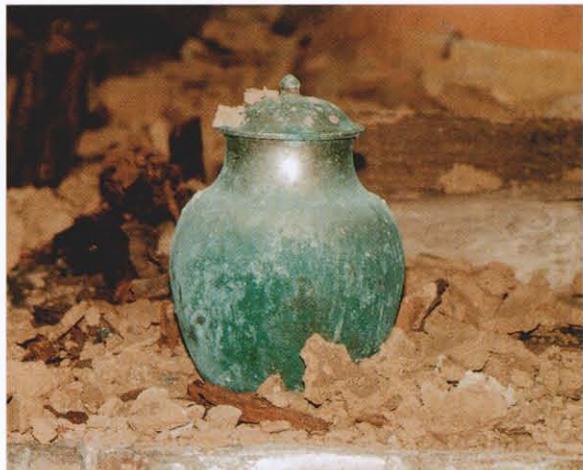
1. 登封法王寺二号塔



2. 登封法王寺二号塔地宫第二道门扉线刻仕女



3. 登封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内的白瓷盒、碗



4. 登封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内的铜壶